

失败者的 探索

徐宗勉 著

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

SHIBAIZHEDETANSUO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失败者的探索

—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

徐宗勉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败者的探索/徐宗勉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6
ISBN 7-80114-999-8

I. 失... II. 徐... III. 民主—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D0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2311 号

失败者的探索

作 者 / 徐宗勉 著

出 版 /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 徐尚定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 100037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2/3/5/6

邮购热线 / (010)68992190

电子信箱 / jiuzhoupress@vip.sina.com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5.5

字 数 / 277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10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10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14-999-8/K · 66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失败者的探索

——1913 至 1915 年间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讨论 / 1

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 / 42

护国战争中有关“维护共和”的若干观念与构想 / 65

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 / 96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 / 125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的认识 / 153

关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几点认识 / 183

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说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特点 / 204

九十年前关于中国民主问题的一场争论 / 218

蒋介石下野与宁汉合流中的派系纷争 / 226

蒋汪合作反桂和国民党的二次北伐 / 241

孙中山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和好朋友 / 268

怀念播种的人

——纪念李大钊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 276

黄远庸：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 / 284

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 300

关于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些想法 / 307

不要忽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

——对《新议》的一点质疑 /314

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进步 /320

积极开展“五四”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 /324

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335

使历史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点意见 /341

史学评论的三种作用 /345

黎澍的“考求历史真实”及其他 /349

胡绳史论二题 /365

《中国农民》介绍 /381

从《胡适研究论稿》看怎样研究、评价历史人物 /411

探究现实中的传统

——读《中国面向世界》想到的 /421

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好方法

——《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中的比较分析 /432

两本《胡汉民评传》的同与异 /441

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发展的新认识

——评《护法运动史》 /454

读《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462

一种粗率而有害的政治主张

——“新权威主义”评析 /472

后记 /488

失败者的探索

——1913 至 1915 年间关于中国如何
实现民主政治的讨论

1913 年至 1915 年间，在中国几家重要杂志上进行过一场关于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讨论。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几乎都参加了这场带有论战色彩的讨论。讨论是在总结“共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展开的，因而提出了一些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发表了若干很有价值的见解；同时也暴露了各派意见和主张的种种弱点，反映了他们在如何使中国走上民主轨道这个核心问题上都陷入了困境。这使追求民主的人们深感失望。于是，失望者起而寻觅一条通向民主的新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青年》创刊于 1915 年 9 月，而在

此之前，一股从总体上怀疑传统封建思想的理性之风已经吹动了。

从支持专制主义到反对封建奴性，这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一些新派人物所走过的道路。这个思想发展过程的主题是民主，正像当时实际政治生活的轴心是专制一样。考察这一段思潮的演变，既是说明富有戏剧性的袁世凯帝国的兴亡史所需要的，更是论述民国思想史和民主运动史所不可缺少的。1913年至1915年间进行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是这种演变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因而不应当被忽视。

从一种把“民国”同“民权” 对立起来的观点说起

民国初年，在一部分革命党人积极鼓吹“民权”的同时，一种主张抑制“民权”的观点也迅速流行开来。这种观点离开共和制度去强调“以国家为前提”，将“民权”的兴废同国家的存亡对立起来，鼓吹限制、牺牲“民权”以张“国权”。当时大多数新派政治家，包括几乎所有改良派人士和一部分革命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形成和宣传这种观点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人而异，除极少数外，也并非出于投靠袁世凯的动机。然而用这种观点去思考和判断国是的人，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或深或浅地采取了支持袁世凯专制主义的立场。在“二次革命”中，政治上陷于孤立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显然和这种思潮也大有关系。

将这种重国家、轻“民权”的观点宣传得最充分，对袁世凯的支持也最卖力的是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梁氏在1912年除夕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因此，他主张“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①。怎样“畸重国权”呢？他的好友及追随者吴贯因说得最为明确：“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之利益，以殉人民。盖国之不存，人民且无所托命，而奚论其利益也。”^② 吴氏这里所说的“人民”都是指人民的整体，不是指任何个人或部分。“国权”绝对高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权”，为了维护“国权”，必须抑制甚至牺牲“民权”，而决不能削弱“国权”以张“民权”。这就是梁启超、吴贯因等人所宣扬的“民国”与“国民”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用“共和”制度解释不通。因为按照当时通行的解释，“共和”就是“民主”，即由国民掌握国家主权，民国的“国权”就是“民权”的一种运用，民国的利害就是全体国民的利害。因此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和国家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国家为了长远利益有时需要对人民的眼前利益施加某种限制，但这种限制按理属于国民对自身利益的调节，而且要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才能实现，因此也说不上是牺牲

^① 《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九，中国华民国二十一年版，第100页。

^② 《宪法问题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号。

民权。梁启超等人之所以要把“民国”凌驾于“国民”之上，当然不是出于对“共和”的无知，而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真正由国民当家作主的“民国”。梁启超在上述文章中说，“极端之民权主义，不过百年前欧洲学者一种空想，按诸真理，揆之事实，其窒碍皆不一而足”。所谓“极端之民权主义”，是指十八世纪西方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主权在民”说，和以此为指导的共和政治。在梁氏看来，“共和”这个名称虽然可以接受，但这种政治制度不可能真正实现，硬要在中国推行它，必然有害无益，必须加以纠正。应当承认，梁启超的这个认识反映了一定的真实。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同“君主立宪政治”一样，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权，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以前者利益为轴心而运转的政治。出自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说，最初是动员群众起来彻底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最有力的口号，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在这种统治已经确立之后，所谓“主权在民”和“共和政治”，对于劳动人民即大多数“国民”仅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形式。这种形式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武器，但它本身对劳动人民毕竟是一种讽刺和欺骗。梁启超斥之为有害的空想，固然说明他对这种“极端之民权主义”的重大历史意义缺乏了解，但同时也说明他从共和制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发展的形式中，多少看到了一点这种民主的虚伪性。然而，他未能更进一步看出这种“主权在民”的有名无实正是西方“民权”不彻底、不完全的表现，反而把它归因于“民权”走了“极

端”，得出多数民众参政弊多益少的结论，以致主张畸重“国权”以抑制“民权”。

梁启超等人说的“国权”，指的是中央政府首先是大总统的权力，“民权”则包括国会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当时临时约法对这几方面的权力、权利都已作出规定。它虽有种种缺点，实际上却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民主性质的宪法。这种民主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它从防止袁世凯复活专制主义出发，对政府特别是大总统的权力限制较多，这使袁世凯十分头痛。梁启超一派人所谓的民权“钝国权之作用”，就是针对临时约法的这种作用而发的。他们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批评临时约法给予大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太小，给予参议院的权力太大，对于大总统无权解散参议院和任命国务员须经参议院通过这两条攻击尤力。而这两条正是袁世凯视为最大的束缚，务欲去之而后快。吴贯因甚至认为临时约法规定的本已有限的人民的自由权还嫌过多，主张给以更大的限制。他的原则是：对于人民的一切权利，宪法上“都不可不为国家保留有限制之余地”^①。可见，所谓“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实际上就是迎合袁世凯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要迎合袁世凯的专制主义呢？1913年4月，梁启超在一次共和党集会上演说时作了回答。其中心意思就是：袁世凯虽然属于腐败势力，但能保障国家的安定，而革命党人为保卫“共和”发动的反袁斗争却会引起“暴民政治”，立即招来“瓜分之祸”。为了避免亡国，目前只

^① 《宪法问题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号。

有支持袁世凯，同反袁的革命党人为敌。他说：“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暴乱派之手段，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我党为此惧，故虽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勉于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①说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会引出雅各宾式的“暴民专制”，甚至会立即招来“瓜分之祸”，显然过甚其辞，不符合当时的形势。但这种斗争一旦发展起来无疑会造成一时的动荡，还必然使“极端之民权主义”更为“嚣张”，这正是梁启超之辈所最害怕的。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超过害怕封建专制势力。他们长时间地支持、容忍袁世凯的专制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挽救国家危亡的动机，毋宁说是出于对破坏现存秩序的恐惧。然而梁启超说的“徐图改造”也并非假话。拥护袁世凯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他们用以达到立宪目的的手段。他们要走曲线：为了实现民主，先要实行专制；为了实现理想，先要牺牲理想。这种关于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曲折的主张就是所谓“开明专制”论。渴望变革现实，但又极端害怕动乱的中国资本家们，此时已对革命、“共和”失去了希望，而幻想袁世凯会给他们带来安宁和发展。“开明专制”论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何谓“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原是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用以反对革命、维护清廷统治地位的一种主张。民国建立后，他所谓的

^①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20、21页。

“开明专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从1912年2月梁启超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可以窥其大概。信中说，中国“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大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则欲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其道何由，亦曰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他建议袁氏对革命党人“不可威压之”，“又不可阿顺之”，“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这样，不愿和不善于从事政党政治的革命党人必然“自归于劣败”^①。为了打动袁世凯，此信不免偏于从袁氏的利害立论，但从中仍可以看出，梁氏此时提出的“开明专制”，扼要地说，就是通过袁世凯这样握有强大实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开明专制”呢？梁启超的回答是：这是实现“立宪政治”的必由之路。他说：“恒言谓政治无绝对之美，吾谓苟能得请于上帝，使常降贤圣之元首以行开明专制，虽谓之为绝对之美焉可也。然兹事固不可冀，苟非其人，则傅虎以翼，故今世政治之轨，壹以立宪为归也。然以未经一度开明专制之国而骤语于立宪，此如与未列伍之卒谭兵，集不学操缦之人使之顾曲，势必步武凌乱，节奏脱落，欲求成章，其道无由。”^②可见，梁

^①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1959年初版，第381—382页。

^② 《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43—44页。

启超的最后目标是“立宪”，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但是，第一，他认为实行“立宪”，首先必须训练好人民，训练的唯一途径就是“开明专制”，尽管有“苟非其人”的危险，也不能不这样做；第二，他所说的“立宪”，主要是一种治理国家、为民造福的比较良善的方法，而不是“民权”的实现。梁氏不懂得西方民主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内容，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少数宰制多数”^①。他从“绝对的自由竞争”并不能给多数人民带来平等这个事实中得出的是平等需要恩赐的结论：“必赖有一种最高之权力，立乎一般人民之上，抑强扶弱，匡其泰甚者，以诱掖其不逮者，然后个人能力，乃得以平等发挥而无所阂。”^②因此，不论就手段还是目的来说，梁启超关于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案都含有非常强烈的贤人政治——确切地说，是贤人加强者政治——的色彩。西方资产阶级是在否定、批判封建的人治和神权的斗争中建立自己的法治。梁启超这里恰恰相反，法治要靠人治来实现，而实行“人治”的“善而强”的“人”又只能靠“上帝”的赐予。西方资产阶级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和封建残余的复辟活动而推戴自己的铁腕人物实行独裁统治和军事专政。梁启超却倒过来把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特殊形式解释成为“得一大贤以作之君，总揽万机，全国受成”^③，认为通过这样的“开明专制”便可以有条不紊地把中国封建专制政权改变为西方式的立宪政

① 《多数政治之试验》，《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36页。

② 《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第48页。

③ 《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文集》之三十，第43—44页。

权。梁氏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史的这种曲解说明：他的“开明专制”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不过，这种主张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实现的却只有专制，没有“开明”。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梁启超以为时机已到，便千方百计地劝告和帮助袁世凯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为此不惜使自己的进步党蒙受袁氏“御用党”之讥。梁启超及进步党此时卖劲地瓦解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并竭力维持国会的正常活动，就是为了使袁世凯能利用“二次革命”失败的有利形势，依靠进步党人的支持，控制和利用国会，以实行“开明专制”。在梁启超看来，“国会、政党”虽然只是形式，但绝非无足轻重，因为“开明专制”是否“开明”首先就在于有无此种形式。他以为他的这种设计一旦实现，就可以“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①。梁启超一派入当时对此信心十足，以致吴贯因禁不住在1913年10月、11月出版的《庸言》上连续发表《中国共和政治的前途》等文章，公然宣称共和制本身就不是完善的政制，共和政治不适合中国。他声言经过“二次革命”的“动乱”之后，中国必然要出现一个专制时代，而经此“专制中兴”过程中对政治的改良，中国才能进入“真立宪”。

然而袁世凯连任何一点共和的形式也不愿保留，他追求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专制权力，要做彻头彻尾的封建皇帝。这种不祥的意向在1913年10月以武力胁迫议员选袁为正式总统和粗暴干涉宪法起草工作等行动中已表露出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42页。

来，因而引起一些进步党议员的愤慨。其中的骨干分子如兰公武、丁佛言，原本就不热衷“开明专制”，此时更不满于梁启超等人的拥袁，便脱离进步党，与脱离国民党的张耀曾等人合组民宪党，决心“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公开声明：“政府而逸出宪政之常轨，吾党则认之为公敌”。^① 这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不赞成“开明专制”论的最早的表示。民宪党人在制宪工作中同袁世凯斗争的唯一结果是加速袁氏摧毁国会的步伐。^② 袁世凯在摧毁共和制度之后，便对“新式政治家”失去了兴趣，将进步党弃置一旁，而他帝制自为的野心也公开暴露，这是当时一些遗老都已看出了的。

“开明专制”论原是进步党人拥戴袁世凯的理论依据，但它在政治、思想上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因为进步党被冷落而消失。首先，它使很多信奉“立宪”的新派人物对袁世凯继续抱有幻想。自从国会解散，进步党人和其他一些改良派分子，由于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点，对袁世凯渐渐产生了不满，但他们的领袖人物并无反对袁世凯的表示，并且在所谓“增修约法”的过程中依然顺从他，就是希望袁世凯借此实行“开明专制”。^③ 袁氏“新约法”公布不久，进步党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理。这篇文章把袁世凯比作华盛顿和克伦威尔，认为“袁大总统之开明专制”实行后，“吾国人如能以强毅正大之

①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二十六年三月三版，第76—77页。

② 参见党公：《民国第一次国会结束记》，《中华杂志》第1卷第4号。

③ 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月出版，二十年五月三版，第310页。

对抗力与之相抗，岂惟不危及共和而已”，还“可利用之辅助之提携之以渐进于民主立宪政治之正轨”，以致“于此短期开明专制中收拨乱反正统一富强之效果”。文章也表示将来并非绝对没有出现拿破仑（即袁氏帝制自为）的可能，但认为按“常理”和现状推定不会发生这种变故。^①李剑农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曾慨叹“立宪党名流的短视病，还不及半同盟会员唐绍仪的明决”^②，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短视，迷于“开明专制”论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开明专制”论也适应了某些旧派人物拥戴袁世凯的需要。这类旧派人物反对民主政治，但不主张恢复帝制，害怕因此引起新的革命。他们追求的是以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用新瓶装旧酒。他们发现“开明专制”正合自己的胃口，便以此为标榜去支持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汪凤瀛就是一个代表。这个后来因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而被誉为“正气可敬”的旧官吏，在民国成立后一直“以为治今日之中国，非开明专制不可，共和政体断非所宜”。他认为袁世凯的“新约法”就是“极端用开明专制之制”，说“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③这说明汪氏一类较为开通的旧派人物当时所以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作出如此远离事实的判断，也是和他们

① 李其荃：《论中国政局之将来》，《中华杂志》第1卷第3号。

② 《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09页。

③ 《与杨度论国体书》，黄毅编《袁氏盗国记》下篇，第103、104页。章士钊在《甲寅》第1卷第10号发表的《民国本讨论》中认为汪氏此文不足以证明他果真主张“开明专制”。章氏这一看法与事实不合。

相信有所谓“开明专制”有关。不过与上述新派人物不同，他们是以“开明专制”为理想，而不是作为实现“立宪”理想的手段。可见，“开明专制”论的作用在于从理论上、政治上美化袁世凯的专制主义，妨碍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斗争。因此，要坚持共和制度，就必须批判这种蛊惑人心的理论。这种批判果然于1914年春天开始了。

是依靠圣贤，还是依靠良善的制度？

1914年4月中旬，袁世凯“新约法”尚在加紧炮制时，丁佛言即在《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袁世凯号称实行“开明专制”，实际上实行的并无“开明”。一个月后，孙几伊发表专题文章，系统地批评吴贯因的《中国共和政治之前途》一文。他指出，吴氏所谓共和政治不能产生“善良之政府”的两大论据，即行总统制“不能免兵争之祸”，行内阁制“不能免内阁更迭频仍之弊”，都不能成立。因为由争当元首而起兵祸的事，在共和国“为偶然之现象”，倒是君主国“不可避免”。至于“内阁更迭频仍”，是立宪政治中“适然之现象”，君主立宪国家同样会出现。吴氏攻击共和宪法“偏重民权”为致乱之源，孙氏反驳说：宪法“与其偏重君权”，“毋宁偏重民权，使国家常有发扬蹈厉之气象也”。文章的结论是：“吾国行共和政治则安，废共和政治则危。”^① 这篇文章虽然立足于改良主义，对袁世凯专制政权的认识也很不彻底，

^① 《中国适用共和政治论》，《中华杂志》第1卷第3号。